

从孔融到陶渊明

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

■ 顾农 著

孔融



陶渊明



 凤凰出版社

013066550

I209
173

从孔融到陶渊明

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

顾农 著



I209
173



北航

C1673705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从孔融到陶渊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 / 顾农
著.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506-1233-4

I. ①从… II. ①顾… III. ①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史—研究—东汉时代②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史—研究—三国时代③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史—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8411号

- | | |
|---------|--|
| 书 名 | 从孔融到陶渊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 |
| 著 者 | 顾 农 |
| 责 任 编 辑 | 林日波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s.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江苏省盐城市纯化路29号, 邮编:224001 |
| 开 本 | 718×1005毫米 1/16 |
| 印 张 | 52.5 |
| 字 数 | 833千字 |
| 版 次 |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1233-4 |
| 定 价 | 12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15-88153008) |

引言

本书观察的对象是汉末三国两晋的作家、作品以及当时文学发展的种种迹象和趋势。

这一段文学时期从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189)起,到东晋灭亡(420)结束,前后有二百三十余年,如果下延到陶渊明去世(427)则有近二百四十年。其间中枢政权经历了东汉—曹魏—西晋—东晋—刘宋四次更迭,除了西晋—东晋是同一王朝由掌握全局到偏安于一隅之外,另三次更迭都是权臣取代皇帝,这样的夺权换代,当时都称为“禅让”^①。与曹魏政权并存的有蜀汉和孙吴,与东晋并存的是北方的五胡十六国。政局之纷纭复杂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样的局面自然不能不对文学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就其中枢而言,新上台的皇帝必然是在前朝之末已经逐步掌握了很大的权力特别是兵权的政要,但他仍有必要作出若干复杂的准备,然后才能实现改朝换代。所以,在新旧交替之前总有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存在两个中心——以旧王朝最后一个或几个皇帝为象征的旧中心和以行将取代旧朝、自己上台之权臣为首的新中心——的并列,于是士大夫和文人就存在一个站在哪一边或取何种倾向的问题,他们必须深刻地思考怎样对待各种变化,煞费苦心地处理公和私的种种关系,态度始终明朗、行动相当得力的固然有人,而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则彷徨、矛盾、痛苦以至于人头落地的情形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魏晋时代文人死于非命的很不少见,其比例之高,在中国文学史上大约是首屈一指的。

① 曹丕在代汉自立升坛礼毕之时,失口道出一句名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据说当代著名艺术家黄苗子先生在被打成“右派”之前不久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每一个改朝换代，总是知识分子最苦闷最彷徨的时候，那时有些人不择手段地去寻找个人出路；有些人则不愿廉价出售自己，却冷静地分析这个新动向；寻找个人出路的人，迎合时尚也是一件苦闷的事，因为这个时尚有时不一定是自己愿意迎合的。但更苦闷的该属于冷静分析这种新动向的人……他并不是不想干，而是有所不为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限制了他。我有时想，高傲、孤芳自赏都不是一个人的自然性格，而是环境把他造成这样的。”^①他把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成功等同于过去的改朝换代，显然很不合适，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那样一个山雨欲来的时候说这样一番话，更是非大倒其霉不可；不过就观察分析魏晋时代文人的心态来说，却可以从这里得到某种启发。文学史说到底无非是心灵史、精神史。

长期的苦难和挣扎孕育出这一段大放异彩的文学。文学的创造力历来多产生于艰难困苦之中，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诗穷而后工”了。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代，一般来说包括从东汉末年的中平六年(189)到曹魏景初三年(239)。用“建安”二字来命名这一时段的文学，无非是因为建安年间(196—220)及其前后出现了大批作家，文学创作空前繁荣。用年号来指称文学史上的某一时段有它方便的地方，也是一个传统悠久的老办法，不过一般来说它总要比该年号所包括的岁月多少长一点。文学史上的建安作家甚多，其中老一代的人物在建安元年(196)之前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文学活动，而其晚一代的人物如曹植等则又在此后的曹魏初年活动了相当一段时间；这一阶段的文学同汉末董卓作乱到曹魏前期即文帝曹丕、明帝曹叡在位期间的政治社会状况关系非常密切。文学史上的建安时代约有五十年，比作为年号的“建安”长一倍。

建安八年(203)曹操《修学令》中称“丧乱以来，十有五年”，他正是从中

① 转引自刘芝明《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十月二十八日在批判右派分子吴祖光和“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大会上的发言》，《戏剧论丛》1957年第4辑。

平末年算起的；青龙年间(233—236)太子舍人张茂说“自衰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士不释甲，每一交战，血流丹野，创痍号痛之声，于今未已”(《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他所说的“四五十年”，正大体相当于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

东汉晚期政局非常之糟糕。先是外戚和宦官的专权大伤了王朝的元气，稍后爆发的黄巾起义更给这个腐朽的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中枢无力，军阀并起；而到中平六年(189)四月汉灵帝死，年仅十五的太子刘辩即位，外戚掌权，头脑发热的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召猛将董卓进京，引狼入室，把中央完全搞乱了，地方实力派讨伐董卓和接下来的混战，把国家拖进了多年的内战深渊。建安元年(196)以后，首都迁到许昌，汉献帝总算被曹操安顿下来并充当了傀儡，成为东汉王朝的一个象征，原先力量不算很强的大英雄曹操从此崛起，逐步控制中枢，形势稍见起色，士人看到了希望，但战争仍然连续不断地打了几十年，灾荒和瘟疫也肆虐了多年，社会动乱，民生凋敝，人口锐减，风衰俗怨。

在这一空前痛苦的时代里也有着正面的东西，这就是在士人中普遍形成了外争功业、内求自由的精英意识，形成了强调个性、远离平庸的超越精神，文学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深重的苦难中掀起了一个空前的高潮。

如果不计个体的差异而只就其大的趋向而言，这一时段的作家有着大体相同的时代风格。刘勰总结这一阶段的文学状况说：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德琰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

其中简要地提到当时作为文坛领军人物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围绕在他们身边的王粲(字仲宣)、陈琳(字孔璋)、徐幹(字伟长)、刘桢(字公幹)、应玚(字德琰)、阮瑀(字元瑜)、路粹(字文蔚)、繁钦(字休伯)、邯郸淳(字子

叔)、杨修(字德祖)等一批作家,概括出他们共同的风格:慷慨多气,志深笔长,深刻地反映了那个痛苦的时代,并指出这种风格的形成与那个特定时代的联系。

这时还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女作家蔡琰,她水平极高,只因为是个女人,刘勰没有提到她。中国古代女作家尚有若干,而甚少女性的理论家、批评家,这是很吃亏的;如果出几个女性文学批评家,情况就应当很不同。

刘勰列出的王、陈、徐、刘、应、阮六位,再加上一个年辈较高、名气很大的孔融,先前曾被曹丕称为“建安七子”,孔融且被列为第一人,其实孔融的情况很不同,曹丕开出这样一份名单另有其政治上的深意;所以刘勰不予理会,另开上述的十人名单。这是大有道理的——这些人如今一般被称为“邺下文人集团”,乃是建安文学创作的主力部队。

在建安时代,自西汉以来一直流行不衰、用以“润色鸿业”的散体大赋是衰歇了,抒情言志的小赋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文人五言诗已经完全成熟,乐府诗的创作非常繁荣,日益与五言诗合流,文辞则渐渐走向华丽——诗歌由配乐演唱到无音乐配合的吟唱朗诵,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并成为后来的主流。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清峻通脱的文风影响极其深远,一直到辛亥以至于“五四”以后仍然大行其道,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章太炎和他早年的弟子鲁迅。

关于建安诗歌,刘勰有如下的归纳——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文心雕龙·明诗》)

其中谈到邺下文人集团诸公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也创作了一批并不直接反映社会动乱的诗篇,而这些作品仍然带有“慷慨”的品格,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而文辞则以简洁明晰见长。这样两个方面如果用一个术语来表达,那就是“风骨”——“慷慨以任气”就是“风”,“唯取昭晰之能”则是“骨”。

建安风骨在诗歌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后来每到诗风萎靡的时候,总有人请出建安时代的亡灵来指斥时弊,呼风唤雨,以求复归于刚健清新的正路。建安文学永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标杆和骄傲。

二

“正始”是三国曹魏后期的一个年号,前后只有十年(240—249),在历史上却大为有名,每当谈到中古时代的思想史、文学史,常常会出现一个术语:“正始之音”^①,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发出来的“音”与玄学与诗学的关系都非常之大。文学史上的正始时代固然首先包括这十年,又还要往下延伸,直到曹魏结束、西晋王朝正式建立(泰始元年,265)的前夜。

如前所述,一般以某一年号标目的文学史时期总比该年号所包括的年头略长一点,“建安文学”是如此,“正始文学”也是如此。

曹魏正始年间的皇帝曹芳(因为中途下台,没有庙号和谥号,史称齐王芳)接下明帝之班的时候还是小孩子,大权掌握在以大将军曹爽为首的宗室、官僚集团手中,另一派以司马懿为首的势力集团则实行韬晦之计,暗中准备通过政变夺权。建安时代是明争,正始时代则变为暗斗;明争使人慷慨奋发,而暗斗则容易引起疑虑和不安,退避的士人总会多一点。

在正始时期微妙险恶的政局夹缝里,思想、文学界出现了两股互有联系的“正始之音”。

思想史上的“正始之音”指的是当时的玄学清谈。

那时的“名士”们一方面把自己的新思想写下来,一方面很讲究进行辩论式的谈话以阐述自己的思想并批评不同的意见,名士们书面表达和口头表达两手都很硬。按照东晋著名文学家、学者袁宏(字彦伯)在《名士传》中提出的意见,正始有三大名士:何晏(字平叔)、王弼(字辅嗣)和夏侯玄(字泰初)^②。何晏是当时的高官,也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和诗人。在思想方面,他致力于带着自己的新思考来挖掘经典中蕴藏的义理,用作思想资料,以阐释经典的方式巧妙地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从而开创了一个崭新

^① “正始”一词早在三国时期以前很久就已经有了,见于《毛诗序》,但那并不是年号,而是“正其初始”(从一开始就把方向搞正确)的意思,由此而衍生的“正始之音”也就是指合于儒家传统之正宗的声音。这样的用法影响不大,也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

^② 袁著《名士传》今已失传,这份名单见于《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指示。此外还有一个钟会(字士季,225—264),其学术水平也相当高,只是人品甚差,后来又背叛了司马氏,袁宏没有将他列入正始名士的名单。

的局面。何晏的基本哲学观点是：

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晋书·王衍传》）

这样的概括里也包括了王弼的意见。何、王的观点原是基本一致的，而王弼尤为简明深刻，具有更严整的体系。《世说新语·文学》有两段记载说：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王弼的思想比何晏更透彻、更圆融；他对老子《道德经》和《周易》作了深入的研究，既有对全书的注释，又有若干专题论文，通过这些论著他确立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哲学，一举推倒了过去那些烦琐沉闷而令人厌倦的汉儒经学体系，包括他们津津乐道的宇宙构成论之类，开辟了一个以本体论解释世界的思想史新时代。王弼英年早逝，何晏、夏侯玄二人则先后被司马氏杀掉，但后来晋朝的许多知识分子对这三正始名士的理论贡献、清谈风采仍然十分仰慕；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类似的人物，便会称赞其人达到了正始名士的水平。如《世说新语·赏誉》载：

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王澄）若在，当复绝倒。”

后来，《晋书·卫玠传》也有同样的记载。又《世说新语·文学》载：

殷中军（浩）为庾公（亮）长史，下都，王丞相（导）为之集，桓公（温）、王长史（濛）、王蓝田（述）、谢镇西（尚）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

大将军王敦夸奖卫玠，丞相王导称赞殷浩，都标举“正始之音”来作比较，在他们心目中，正始的玄学清谈乃是一个标杆，能达到那样的水平就算是一流人物了。这种清谈的风气一直贯穿到东晋，直接促成了玄言诗的繁荣。

文学史上的“正始之音”指的是当时的创作，特别是诗歌。

在正始时期除了以何晏为首的一批名士之外，还有后来被称为“竹林七贤”的一批知识精英，其中阮籍、嵇康二人尤为突出，阮籍的五言《咏怀诗》八十首和嵇康的四言诗在文学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此外何晏、应璩等人也颇有诗作。这样一些诗篇也曾被称为“正始之音”。

李善《上〈文选注〉表》有云：“楚国词人，御兰芬于绝代；汉朝才子，综鞶帨于遥年。虚玄流正始之音，气质驰建安之体……”这里将“正始之音”与“建安之体”并列，显然是指正始时期的文学创作而非玄学清谈，因为《文选》只录狭义的“文”，不收理论性的论著。

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云：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标举“正始之音”，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他希望东方虬的《咏孤桐篇》和自己的《修竹》诗能在纠正“文章道弊”、提升咏物诗之素质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关于这篇以书作序的著名文献，一般认为就是标举建安风骨以反对齐梁文风，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尽管陈子昂的一些用语，如“汉、魏风骨”、“骨气端翔”之类，显然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他攻击六朝颓靡绮丽的文风也与刘勰当年的议论方向大体一致，但着眼点其实并不一样。陈子昂最重视的是“兴寄”，他提倡在咏物之作中有寄托，反对南朝的为咏物而咏物，一味以形似和华彩见工。咏物诗在南朝的畸形兴盛是所谓“宫体”的产物，刘勰未及看到，当然也不可能预先作出什么抵制和批判；陈子昂要对付宫体的流毒，他所高度评价的东方虬的《咏孤桐篇》和他本

人的《修竹篇》都是咏物而其中有所寄托的。为了替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寻找历史依据,陈子昂一下子就看中了“正始之音”,那就是以阮籍《咏怀诗》为代表的传统,他要召唤历史上的这一部分亡灵来对抗眼前文坛上“兴寄都绝”的颓风,他这样做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兴寄”是正始诗坛的特色,陈子昂夸奖东方虬的大作为“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就是欣赏他能够继承正始的传统,通过咏物来抒情寄意,这样就“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了,他的意思是说正始、建安水平相近,而正始更高,所以他不谈建安风骨而说“汉、魏风骨”。他之所谓“汉、魏风骨”固然不妨包括建安诗歌,而尤其要包括“正始之音”。

总之,李善、陈子昂文章里分别给予崇高评价的“正始之音”是指正始时期阮籍等人的诗歌作品;他们或肯定其文学史地位,或认为可以作为当今创作的楷模。萧统《文选》录入阮籍的五言《咏怀诗》十七首、嵇康的《幽愤诗》、《赠秀才从军》五首、《杂诗》、《琴赋》、应璩《百一诗》以及何晏的《景福殿赋》,此外还选了正始时期创作的若干散文。在曹魏后期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正始的文人学士取得了异常丰富的成果,在思想史、文学史上大放异彩,这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而“正始文学”也因此得以确立。

三

西晋王朝的建立,较之曹氏代汉费了更大的力气。先前的汉献帝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曹操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取得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胜利之后获得的,他完全有条件取而代之,而他只当周文王,由儿子曹丕来实施改朝换代。曹魏代汉,虽有阻力,但不算很大。司马氏面临的情况就不同了,为了取代曹魏,须克服巨大的阻力,花费多年的功夫。

西晋王朝建立后,曾反复讨论所谓《晋书》限断亦即晋王朝的开始应当从何时起算的问题。当时的意见分为三派:一是正始(240—249)开元说;二是嘉平(249—254)起年说;三是以泰始(265—274)为断说^①。从泰始为断

^① 《晋书·贾谧传》:“先是,朝廷议立《晋书》限断,中书监荀勖谓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以下朝臣尽入晋史,于时依违,未有所决。惠帝立,更使议之,(贾)谧上议,请从泰始为断。于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张华、领军将军王衍、侍中乐广、黄门侍郎嵇绍、国子博士谢衡皆从谧议。骑都尉济北侯荀勖、侍中荀藩、黄门侍郎华混以为宜用正始开元。博士荀熙、刁协谓宜嘉平起年。谧重执奏戎、华之议,事遂施行。”

这一意见按说很容易理解,因为从这时起才正式改朝换代,可是开始讨论这一问题时此说竟然没有出现,意见的分歧仅仅在于是从正始起算还是从嘉平起算。这是很值得玩味的。西晋的开国之君武帝司马炎自己没有费什么劲,靠的是先辈开创的基业。按自魏明帝曹叡死,齐王芳上台,司马懿已成为顾命大臣之一,到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彻底消灭以另一顾命大臣曹爽为首的政治集团,改元嘉平,从这时起,中枢大权已落入司马氏之手。无论是从正始开元还是从嘉平起年,都是要把晋王朝的开端放在司马懿这一代领导人手上,只是算法有宽严之不同而已。

从高平陵之变得手到西晋王朝正式建立,司马氏同反对派苦斗了十多年。其间皇帝换了好几个(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陈留王曹奂),年号换得更多(正始、嘉平、正元、甘露、景元、咸熙),政局反复震荡。新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两个政治中心并存的局面终于结束。此前蜀已被消灭,随着对吴战争的胜利(太康元年,280),全国重新统一,出现了空前大好的形势。可惜好景不长,只太平了二十年,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发动宫廷政变,八王之乱开始,北方少数民族酋长乘机占据中原地盘并迅速扩张,西晋王朝则迅速由盛而衰。

西晋文学即以八王之乱爆发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其前期可称为太康时代,实指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全部以及惠帝司马衷在位的前半,用年号来说,则包括武帝的泰始(265—274)、咸宁(275—279)、太康(280—289)、太熙(290),以及惠帝的永熙(290)、永平(291)和元康(291—299)——总计三十四五年。

西晋前期使用时间比较长的年号有两个,一为太康,一为元康,这两段时局也比较稳定,若取某一年号为西晋文学前期的代称,这二者当居其一,也曾经有人选用元康,例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称“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缙旨星稠,繁文绮合”;近贤罗庸先生讲魏晋文学,第一讲为《建安文学与正始玄风》,第二讲就是《元康文学与过江名士》^①——这样当然也未尝不可,但考虑到太康是西晋最盛之时,中国的重新统一就在此时,文学的最为繁荣也在此时,传统文学批评中标举得最多的

^① 详见郑临川先生整理之《笳吹弦诵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238页。

也是太康^①，所以更为合适的是用“太康文学”来指称西晋前期的文学。

西晋文学的后期可称为永嘉时期，实际包括晋惠帝司马衷的永康（300）、永宁（301）、太安（302—303）、永安（304）、建武（304）、永兴（304—305）、光熙（306）和怀帝司马炽的永嘉（307—312）、愍帝司马邺的建兴（313—316），总计十五六年。时间不长，而年号屡屡改换，甚至一年之内换好几次，这正是政局不稳甚至天下已乱的标志。

西晋文学的繁荣在前期。钟嵘《诗品·序》写道：

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他又标举“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潘岳）、景阳（张协）为辅”。《诗品·序》又道：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钟嵘正以太康与永嘉分指西晋文学的前后两期，高度评价其前期，而认为后期诗坛已经陷入玄言诗的泥淖，不足观了。

早一点的刘勰，看法同钟嵘非常相近，《文心雕龙·明诗》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这里关于西晋未做进一步的分期，而所论实为其前期——作为正面人物提到的“张、潘、左、陆”，正是钟嵘所说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这些作家主要的活动年代都在西晋的前期，只有张亢活得比较长久——然后就急转直下地去谈东晋的玄言诗了。刘勰对他最不以为然的文学时段往往根本不提或仅仅一笔带过，以表示他最大的轻蔑。这乃是一种最有力度的“默杀”。

永嘉时期西晋王朝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其中永嘉（307—312）是西晋后期用得最长的一个年号，也是历史行将发生巨变的过渡时期。到这时候，谁都明白司马氏的政权在中原是呆不下去了，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将中枢安排到长江以南去。司马睿于永嘉元年（307）进驻建康（今南京），代表了

^① 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甚至有“太康体”的提法，就此他解释说：“晋年号，左思、潘岳、三张、二陆诸公之诗。”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五）云：“以太康较魏末，则为中兴，以建安视太康，实为再变。知此，则永嘉以后可类推矣。”如此等等。

政局的未来,中原士人纷纷大举南迁,形成了一个“四海南奔”的可悲而壮观的景象^①。这时候在前一阶段十分活跃的作家大部分已成古人,其中颇多死于八王之乱者,水平最高的潘岳和陆机这两位即分别死于赵王司马伦与成都王司马颖之手。西晋前期文学的繁荣完全被内乱打断了。

在西晋后期的这十几年中,不少文人为逃避苦难的现实而一味沉溺于玄谈,玄风大举侵入诗歌创作中,形成钟嵘所说的“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永嘉玄言诗已大量亡佚,现在能见到的,以卢谌《赠刘琨》的一组(《文选》卷二十五)最为典型;在这种风气中能够超出流俗而写出优秀作品的是刘琨和郭璞,其中刘琨年辈较长,他先前曾与潘岳、左思、陆机等人同在“二十四友”之列;郭璞是新一代作家,他的许多作品已是进入东晋以后的收获。

四

东晋王朝有一百零几年(317—420),文学史的这个时段比建安、正始、西晋都要长,但成就却不如前三个阶段,给人印象深刻的大作家和著名作品比较少——当然,这时出现了一个陶渊明,他是整个魏晋时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文学人物之一,这一座高峰足以弥补东晋这一大片丘陵地的缺憾而有余。

东晋时代,司马氏皇室虽然还算是高踞于一切臣民之上的最高权威,但这只是象征性的,事实上它必须紧紧依靠若干高级贵族世家,如王、庾、郗、桓、谢诸家来共同维持局面。其间王敦、桓温先后有问鼎之意,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得手,而桓温之子桓玄是正式取代东晋上台称帝的,但他很快就失败了,只是一方面沉重打击了东晋王朝,一方面给出身下层的军官刘裕一个重大的机遇;稍后刘裕打败了桓玄,然后又苦心经营多年,终于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宋。

东晋皇室的软弱无力和世家大族轮番共同掌握政权,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门阀政治,这一局面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反映是基本上没有权威,多元并存,思想活跃,各得其所。玄学大盛,而儒、释、道也一同繁荣,儒

^① 李白诗有句云“四海南奔似永嘉”(《永王东巡歌》其二)。

家思想仍为正宗,名僧与名士并驾齐驱,道教在上层和下层都广泛传播。无论你主张什么,都没有行政力量来干预,只是产生了频繁而活跃的清淡式的辩论。

但是在这种格局下,文学创作却出现了式微之势;当然也不能说东晋作家除了陶渊明就全都不行,这里有意思的作家还是不少的,如郭璞、袁宏、王羲之、孙绰等等;但更多的士人似乎不愿意在文学上多花功夫,宁可去清淡,或著子书,或信笔写一点玄言诗。东晋的士人非常注意保持贵族精英的身段,采取超越世俗的态度,追求潇洒自由的人生,写诗作文,仅为余事。即如最杰出的名士兼高官谢安,文学修养极高,但他或在东山高卧,或发挥军政韬略,全都洒脱之至,却很少动笔写文章。在他看来,像曹植、阮籍、陆机那样的活法,大约都是无事忙,找罪受。陶渊明的作品在东晋算最多的,而在他自己,也只是“自娱”而已,并没有想藉此不朽的意思——他对不朽毫无兴趣,曾大声疾呼道:“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神释》)这样的选择和取向也自有他们的道理,比起人生来,文学到底相当次要。

陶渊明晚年已入刘宋;晋宋易代进行得比较自然,对陶渊明虽有某种刺激,却不算很强。前人以“忠愤”论陶虽然并非毫无根据,但确有过分之处。本书写完陶渊明即基本结束——谈谈谢混等人,只是余波。其余由晋入宋的诸家,本书中有时也许会提到一下,不能展开,那是要另案处理的了。

与东晋几乎同步的,是北方的五胡十六国,文学方面可谈的内容比较少,为行文的方便起见,附列于西晋一章之末来叙述。

根据上述对于文学史分期的看法,本书分为四章,又以人为单位再分为若干节。笔者不想写成现在已经很多了的教科书模样,尽管作为此书之准备材料的,有我多年来的一大批讲稿,所以内容不求面面俱到,有看法就多谈一点,其余则少谈或干脆不谈。这正应了一句老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或者竟无。文字不甚讲究整齐修饰,大抵属于通脱一路。总之,说什么,怎么说,都比较自由放松,希望读者读起来不至于很吃力伤神。魏晋时人本来就追求自由和放松,谈论这一段的人和文,自应也是如此。知我罪我,全在读者,希望多多听到批评的意见。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建安慷慨	1
一 孔融及祢衡	2
二 曹操	26
三 蔡琰	58
四 邺下文人集团	85
五 曹丕	135
六 曹植	172
七 其他建安作家	213
第二章 正始玄远	244
八 何晏与钟会	245
九 “七贤”林下之游	268
十 嵇康	284
十一 阮籍	321
十二 向秀及其他	366
第三章 西晋绮靡	381
十三 傅玄与张华	382
十四 陆机	413
十五 石崇和潘岳	457

十六 左思	481
十七 “三张”	511
十八 刘琨	531
 第四章 东晋风流	555
十九 郭璞	556
二十 葛洪	575
二十一 晋代小说家	589
二十二 袁宏、孙绰及许询	614
二十三 王羲之与兰亭集	638
二十四 陶渊明	662
二十五 谢混与“乌衣之游”	724
 余 论	736
 附录一 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大事记	778
 附录二 汉末三国两晋文学书目	819
 后 记	821